

YUANCHAO ZHONGCHEN LIUBINGZHONG YANJIU

葛仁考 著

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



家世与早年经历

遁入佛门

藩府建功业

建立元代成宪

酌古宜今的治国谋略

儒释道思想

因材施教

著述流传

身后诸事



人民教育出版社

YUANCHEN LUBINGZHONG YANJIU

葛仁考 著

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



家世与早年经历
通入佛门
藩府建功业
建立元代成宪
酌古宜今的治国谋略
儒释道思想
因材施教
著述流传
身后诸事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 / 葛仁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01-013182-5

I. ①元… II. ①葛… III. ①刘秉忠（1216~1274）—人物研究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238 号

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

YUANCHAO ZHONGCHEN LIUBINGZHONG YANJIU

葛仁考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182-5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李治安

葛仁考博士撰写的《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即将付梓，索序于我。因为自己没有对刘秉忠问题做过专门探研，仅就“刘秉忠与元初政治文化”谈几句感言。

刘秉忠是元朝建立前后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在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实行“汉法”改革及建立与汉人士大夫等精英的政治联盟过程中，刘秉忠贡献杰出，由此促成和奠定了元王朝蒙、汉二元杂糅的政治文化格局。具体地说，刘秉忠充任了忽必烈藩邸和建元朝的主要谋臣，充任了汉法派官僚的领袖，并且创立“邢州术数家群”，故而如本书题目所云，刘秉忠在世祖朝政坛及政治文化格局中堪称“重臣”。

刘秉忠是最早北上为忽必烈所重用的汉文士。一般认为，刘秉忠在忽必烈藩邸和建元朝过程中主要做了四件大事：（1）荐举中原人才；（2）上万言书建言中原情势和革除弊政；（3）从征云南和攻鄂州，建议“不杀”和北归抢先即汗位；（4）建两都，定国号，创朝仪，制历法，立官制。类似的改革建议，虽然其他文臣武将也不约而同地提出过，但刘秉忠运用术数才能以及忽必烈对他言听计从的紧密关系，居中扮演了“扇羽毛扇”的角色。元人王磐将他比作姜子牙和伊尹，徐世隆将他比作诸葛亮和黑衣

慧琳等。^①称其为元世祖忽必烈驾前的主要谋臣,是实至名归的。这方面前辈学者论述已多,《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又予以系统深入的阐述,兹不赘。

谁是元初汉法派官僚的领袖?迄今似乎缺乏一致的认识,尚难遽然认定。若论职务,右丞相史天泽的官职最高;若论在儒臣群体精神层面的地位,北方理学宗师许衡当是精神领袖和旗帜。笔者以为元初汉法派官僚真正的领袖或主帅,非刘秉忠莫属。笔者的这一见解,大致有如下四条依据或理由:(1)刘秉忠以忠心追随、占卜有验、奏事中理,且能与忽必烈直接交流沟通,最受忽必烈信赖。^②故而在元初上述四项汉法改革中,刘秉忠发挥的实际作用最大。察必皇后称其“言则帝听”,王磐云:忽必烈“待以心腹,契如鱼水,深谋密画,虽耆宿贵近不得与闻者,悉与公参决”。^③殆非虚言。(2)汉法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只是儒学和理财,也包括刘秉忠擅长的道家术数等,后者更受忽必烈等蒙古贵族青睐。(3)在忽必烈藩邸旧臣中,右丞相史天泽曾与李璫叛乱有染,理学宗师许衡也曾受忽必烈“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等责备^④,二人显然并不十分获得忽必烈的信任及重用。窦默、姚枢虽然和忽必烈近密,但在汉法派官僚中影响有限,难当领袖重任。诸多研究表明:刘秉忠出入儒释道,学问杂驳,在理学儒士、词赋文人、权谋经略者、僧人、道士、汉世侯等范围内,多所举荐,广泛交游,在最被忽必烈信任的同时,又受到汉法派官僚的普遍尊敬。(4)汉法派官僚以刘秉忠至元十一年(1274)早亡及其紫金山旧友张易至元十九年(1282)被杀为标志,政治势力一蹶不振,汉法改革基本完结,汉法派官僚此时段的颓势,亦可反衬刘秉忠的领袖角色。

刘秉忠对元初政治文化方面的第三个贡献,即创立“邢州术数家群”,在元代文坛学林中奇葩独秀。关于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文人群体,萧启庆、谷志科和我先后有一些说法。萧启庆先生从忽必烈“潜邸旧侣”学术、言论、进

① 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徐世隆:《祭文》,载《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② 陈得芝先生指出:“有元一代能与最高蒙古统治者沟通‘契合’到如此程度的,恐怕只有刘秉忠一人。”参见《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页。

③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世祖昭睿顺圣皇后传》。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载《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④ 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9页。

用途径的角度,称之为“邢州集团”。谷志科等径直称之为“邢州学派”。我则侧重于几个领袖和骨干人物比较一致的学术倾向,称之为“邢州术数家群”^①。虽然各有自己的视角和判断,但我认为,使用“邢州术数家群”的名称,相对贴切。在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魏晋以来“民族走廊”或民族融合区的邢州,涌现出一个以“驳杂”、“多边研究”和注重科技实用为特色的学术群体,乃元初时势与精英互动所造成,也可谓应运而生。元朝国祚不长,而且文化基本格局是蒙古文化和汉地文化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充任主导的蒙汉二元。元朝近百年间称得起学派的,原本就寥若晨星。邢州术数家群“驳杂”、“多边研究”及实用的特色,大抵是与许衡等理学家及东平、河东一带的词赋文士,存在显著差异。就其特色和成就来说,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完全可以和许衡等理学家并驾齐驱,称得上元初北方地区的两大重要学术派别。邢州诸精英在天文、历法、水利、建筑、数学等领域的杰出作为,堪称元代文化发展的最大“亮点”。它不仅让元初因战争破坏而落后、黑暗的经济文化,勃兴起一股充满生机活力的科技文明曙光,进而为忽必烈接受汉法的改革推波助澜。更值得称道的还在于,邢州术数家群诸精英在两千年儒学大一统秩序和绝大多数文人痴迷于皓首穷经的潮流中,敢于独树一帜,集群性地把毕生大部分智慧和精力投入天文、历法、水利、建筑、数学等领域,并且做出了轰动古今中外的科技贡献。这类成就虽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尚能受到尊重和善待,但在汉武帝以后就被世人贬斥为雕虫小技和不务正业了。而这恰恰是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虽有“四大发明”,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水平却得不到及时提升,长期与“工业革命”分道扬镳的悲剧症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邢州术数家群诸精英可谓后期中华文明的真正“脊梁”,而且是最能代表未来先进文化的精英“脊梁”。遗憾的是,当时他们只算是学术异端的奇葩,并非士大夫的主流,为统治者所青睐的作用也仅限于元前期的五六十年。元仁宗恢复科举,特别是明朝以八股文取士之后,文人士大夫们又重新回归到皓首穷经的“正统”浪潮之中。从上述长时段看,似乎更能窥见邢州术数家群的可贵

^①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载《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5页。拙著《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谷志科、宋文主编:《邢州学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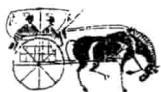
与进步。

葛仁考博士原籍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攻读博士学位之际主要研究“元代直隶省部”,也曾经是《邢州学派》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近年,又在前人探研的基础上撰成《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一书。他聚焦和倾注很多精力的,始终是故土乡梓,也属于元王朝的“腹里”直隶核心地带和核心文臣。通观该书,囊括刘秉忠家世履历、遁入佛门、藩府建功业、建立元代成宪、治国方略、儒释道思想、因材施教、著述流传、身后诸事等九章,设计精心,层次分明,内容丰富,探讨系统而深入。诸如刘秉忠等紫金山“同学”地点、时间的考订,对“大元”国号和“酌古宜今”的阐释,颇为精审,且见解独到,不少方面超越了前人成果,可以说是国内刘秉忠研究的集大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期盼葛仁考博士再接再厉,不断攀登,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是为序。

2014年3月于天津金厦里

(作者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目 录

序 / 李治安

导 言 金元之际的北方社会 /1

- 一、政治视野下的河北地区 /2
- 二、风雨飘摇的邢州 /6
- 三、顺德路创建考证 /10
- 四、刘秉忠研究综述 /15

第一章 家世与早年经历 /18

- 一、祖籍瑞州考辨 /18
- 二、家世 /21
- 三、少年坎坷路 /24

第二章 遁入佛门 /30

- 一、邢州天宁寺 /30
- 二、邢州僧师友 /34
- 三、云中遇贵人 /42

第三章 藩府建功业 /51

- 一、举贤荐能 /51

二、邢州大治 /55

三、随征大理 /60

四、修建开平 /68

五、己未伐宋 /79

第四章 建立元代成宪 /85

一、建元改号 /88

(一)建元表岁 /88

(二)建“大元”国号 /91

二、立官制、定朝仪 /96

(一)筹谋官制 /97

(二)规制朝仪 /100

三、设计元大都 /105

(一)元以前北京城市建设 /106

(二)刘秉忠修建大都城 /109

(三)两都巡幸制度 /117

第五章 酌古宜今的治国谋略 /120

一、万言书 /121

二、应时变通的政治理念 /126

三、保民务本的经济策略 /129

四、注重传承的文化经营 /131

第六章 儒释道思想 /134

一、宋金元时期的“三教合一” /134

二、佛家之身 /138

(一)法系归属 /139

(二)佛门师友 /140

(三)佛道辨伪 /142

(四)禅学诗词 /146

三、道家术数之用 /149

- (一)术道渊源关系略论 /150
- (二)北方民族萨满信仰 /153
- (三)刘秉忠的法术表现 /154
- (四)刘秉忠与道教的关系 /160
- 四、儒家之心 /163

第七章 因材施教 /169

- 一、紫金山研学考辨 /169
 - (一)紫金山地望考 /170
 - (二)紫金山学习时间考 /173
 - (三)紫金山学人考略 /175
- 二、纯德实学——郭守敬 /176
 - (一)生平 /177
 - (二)科技成就 /184
 - (三)刘秉忠对郭守敬影响 /188
- 三、刚棱嫉恶——王恂 /194
 - (一)聪颖年少 /194
 - (二)授业太子 /196
 - (三)精心制历 /201
- 四、自持端重——赵秉温 /203
- 五、神仙中人——史杠 /208
 - (一)史氏家族 /208
 - (二)生平 /210
 - (三)成就 /212
- 附录：元代太史院探研 /214
 - (一)太史院设置 /214
 - (二)太史院官员考 /219
 - (三)太史院职能 /227

第八章 著述流传 /230

- 一、刘文贞公集 /230

- 二、藏春集 /232
- 三、藏春词 /237
- 四、散曲文章 /239
- 五、平砂玉尺经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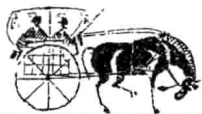
第九章 身后诸事 /246

- 一、墓葬、祠堂及后人 /246
- 二、世人评价 /253

附 录 刘秉忠年谱 /260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80



金元之际的北方社会

刘秉忠(1216—1274),元代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原名侃,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又号寥休上人^①。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至元元年(1264)八月癸丑(二十日),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复其姓刘氏,易名秉忠”^②,封为太保(元代汉人中唯一获此封号者)、参领中书省事、同议枢密院事。刘秉忠是元代儒、释、道兼通的政治家、诗人,有《藏春集》传世。刘秉忠生活的时代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急剧转型时期:从政治形势来看,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原王朝政治强势的“汉唐模式”难以为继,北方辽、金、元等民族政权以咄咄逼人之锐气,节次南进;另一方

① 刘秉忠《刘太傅藏春集》卷四《遣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一),第82页):“静守穷庐事不侵,闲中一日抵千金。傍人自任多评论,此是寥休道者心。”《刘文贞公集》收录《初夏寄宋先生》(《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〇,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廖休百年何所宝,几册诗书堪到老。”《席上》(《永乐大典》卷二〇三五三):“廖休佯作逢场戏,声色门头自任迷。”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与叔谦太常论书》:“近年书学果谁优,说道寥休有悟头。意态偶从驱字得,千金骏马倚山丘。”《中堂事记》:“五日丙寅问前省官事。已刻,寥休上人来自南庵,诸相就谒于龙光北寺。识所谓温庵主者。……十四日,甲子,藏春来自南庵。午刻会食史相行馆。寥休以洒墨玉盂罍赠公,及观所作玉镜,命诸公赋诗。西庵有幸自得辞‘涂抹手照人,无用太分明’之句。仲晦为忻然也。”南庵指刘秉忠所建之开平南屏山精舍。温庵主指刘秉忠的关系密切的乡友僧人至温。藏春、仲晦俱是指刘秉忠。西庵指杨果。由以上可知,寥休亦即刘秉忠。陈得芝先生在《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论丛》第九辑,第10页)已经指出:“寥休上人为刘秉忠之号”。

② 宋濂:《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校勘本1976年版。

面,北京地区逐渐演变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元大都开明清北京之先河,河北地区则相应成为其最倚重的根本地带,演化为所谓“直隶”的畿辅区域。以经济趋势而论,南方的江浙一带牢牢地站稳了全国经济的领军势头,依托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各王朝的粮仓。就文化发展而言,由于元朝中后期的科举考试对理学的青睐,以及以后明清时期的继承,宋金元时期科学技术领先世界的地位开始动摇,明清时期注重伦理说教,而不重视实学。在这场大的社会变革中,许多英才脱颖而出,刘秉忠可谓其中重量级人物。在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刘秉忠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一、政治视野下的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为“唐尧发祥之邦,成周以降,齐晋交错于前,燕、赵、中山称雄于后”^①。自秦汉至隋唐时代,王朝的统治中心为长安一带的内陆地区,王朝边境外患主要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铁勒、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期间,尽管有鲜卑等五胡乱中华时期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统治中心的建立,如石勒建都襄都(今河北省邢台市)等,但总的南北对垒形势没有发生在河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政治内忧,例如有袁绍、安禄山等一度的地方势力和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都曾经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但河北地区基本上为不受重视的边缘之地。

台湾著名民族史学者姚从吾曾言:“东亚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单位。它的组成:应以中原的汉、唐(宋明姑且包括在内)为主流;东北的金、清、辽、元为两大支流;其他西北、西南、东南若干民族的文化为小的支流。中原文化具有世界性,富于人情味;历经东亚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模仿参加,交流混合,而主流的地位日益稳固。就它的演变说,提纲举要,大的混合,计有四次:即是通常所说的,第一次的混合是秦、汉,第二次是隋、唐;第三次是辽、金、元;第四次是明、清。”^②就此所论中华文化演变的四次混合,从第二次后期以至第三次、第四次,河北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自唐末以来,受北方或东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

① 于学忠:《(重印)畿辅通志序》,(光绪十年)《畿辅通志》重印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② 姚从吾:《女真汉化的分析》,《宋辽金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五册,大陆杂志社编印,第278页。

响,河北地区成为中华南北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

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崛起的新城市显示了新的势态:汴梁以四河汇聚之地受到了其后王朝统治者的青睐。^①“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孳廩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需。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②自907年后梁皇帝朱温建都汴梁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成就契丹国业,河北地区作为南北冲突前沿阵地,在全国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势成必然:以往的边缘之地,开始逐步改变成为首当其冲的对垒边患重地。石敬瑭恭送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燕山对北方民族的自然阻挠因而消失。河北地区演化为其后宋、金等中原王朝重要军事前沿,时人由衷地感慨:“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犯贼冲,为国门户。”^③这种表达显示了河北重要的军事地位。五代中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定都于汴梁,乘此威势,960年建立宋朝的赵匡胤依然定都于汴梁。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之际,宋太宗希望一鼓作气收复幽云之地,成就不世之功业,然而高粱河决战和“雍熙北伐”的失败,沉寂了宋朝政府北望的企图。1044年,契丹入侵北宋的澶州战役出现双方妥协的结晶——《澶渊之盟》。从此,河北中部的白沟成为辽宋南疆北界的接点,很多文人士大夫透露出对于北方边事产生的感慨和无奈。比如王安石曾作诗: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④

历史发展至此,中原王朝汉、唐丰功伟业已无法再书春秋。北宋王朝(960—1127)时期与辽朝划白沟为界,自周朝以来属于中原版图的燕京地区归附于少数民族政权。东北的女真以强大的武功先给北宋乃至整个汉民族数千年历史留下“靖康之难”的奇耻大辱,后将南宋(1127—1279)抑制为偏安东南半壁江山的王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1页。

②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七七《晋书三·高祖纪》,中华书局校勘本1976年版,第1020页。

③ 宋祁:《上仁宗论河北根本在镇定》,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9页。另见:《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中华书局校勘本1977年版,第9596页。

④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五《白沟行》,四部丛刊本。

朝,所向披靡的蒙古势力再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把两宋(960—1279)的基业化为云烟。所有这一切的切口又恰恰着落于河北地区。

北方的女真政权于1125年、1127年分别灭亡了辽朝和北宋政权。至此,金朝全部占有了河朔一带。河北地区整体开始受制于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朝在这里设置了中都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和大名路,基本延续了宋代河北路(曾分为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和辽代南京路。十三世纪初,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开始攻掠河北地区。河北地区人民又一次被卷入征服战争的最前沿。由此,自五代后晋以来,河北地区成为接受战争洗礼首当其冲之地。这一趋势历经宋辽、宋金、金蒙等多次朝代更替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蒙金战争肇始于河北地区,并且在灭金过程中,降蒙的河北汉世侯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国朝龙兴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杰,起应以兵,而金灭矣。若真定史氏,东平严氏,满城、济南两张氏,是也。”^①其中所言真定史氏指的是史天泽家族,满城张氏指的是张柔家族,另有藁城董氏家族,这些家族充当了蒙元战事的先行军。他们不仅追随木华黎扫平金朝河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而且协助蒙军攻打大理、南宋地区。至元十年(1273),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蒙,元世祖忽必烈遂有“扫清六合混一车书之意”,“明年(1274)春,诏公(史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②。张柔九子张弘范充当灭宋急先锋,“弘范将命入城,数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称臣降表来上。”至元十五年(1278),俘获文天祥于五坡岭。文天祥正是在张弘范的军营囚禁中,写下著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至元十六年(1279),张弘范打到崖山,彻底亡宋,“宋臣抱其主昷赴水死。获其符玺印章。世杰先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杰走交趾,风坏舟,死海陵港。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③

近人曾言河北地区地理之壮观“右控太行,背负边塞,渤海襟抱于东陲,九河

①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爵:《元文类》卷七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05页。

②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姚景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1页。

③ 《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

纵横于腹地。其山川之壮丽,文物之殷赆,于历史地理均占重要之位置。……在元、明、清三朝,控驭八荒,为时且六百余年。此邦地志固当弁冕诸行省。”^①此地之“背负边塞”,正如学界所言“河北大地几千年来,基本上是平原的农耕经济与草原的畜牧经济汇合处之一,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处之一,也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聚焦处之一。”^②可以说,元朝时期的河北地区成为自唐末以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锋的最重要节点。由于“山川之壮丽,文物之殷赆”的地利之便,两种文明交接点的经济特点,及其共同衍生的政治形势,造就了元王朝以来其京畿地区的形成。河北地区这种历史定位成就了忽必烈和刘秉忠君臣共同营造大元帝国的历史机遇。

从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雄才大略的忽必烈可谓“前不见来者”,正如国外学者所论:

这是5世纪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忽必烈最终完成了。正是他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所有居毡帐”民,即世世代代的游牧民们,所抱有的朦胧梦想。草原上漫游的牧民们,即“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随着忽必烈一起,最终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③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改为上都)登上汗位,1274年定燕京为大都,接受百官朝贺。自此,两都巡幸制度逐渐完善。以元大都为首的河北地区“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④,自元朝至今,北京地区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主体。^⑤河北地区由蒙古帝国时代燕京行台的辖地成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⑥在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元朝设立山东、山西宣慰司分别管辖山东、山西地区,这样,河北

① 于学忠:《(重印)畿辅通志序》,(光绪十年)《畿辅通志》重印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② 孙宝存:《河北经济史》序,见: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河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3页。

③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硕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5页。

④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⑤ 关于元大都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研究,参见:王岗:《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元史论丛》十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⑥ 《经世大典序录·赋典总序·都邑》,见:苏天爵:《元文类》卷四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16页。

又具有更独特的“拟汉三辅”^①之京畿特征。河北这一京畿特征被以后的明朝继承,明朝的北直隶地区进一步完善了河北地区直属中央管理的建制。清代对明代的这一名称继续保持,并形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直隶”省级行政实体。这一程序一直持续到1928年北伐战争,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河北在元代开始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直隶”地位,一直历经元、明、清,时间跨度为654年(1274—1928,期间有明朝初期的北平行省等管理体制)。如此,在河北地区向省级地方机构演进过程中,元代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元、明、清行省制度演变进程,演绎了河北地区作为政治中心之“天下之根本”,亦即“直隶”和“畿辅”性质的历史变迁。元代地方行政继承前代而又不同于前代,这在腹里的河北地区表现明显,“唐以前以郡领县而已,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具载于篇,而其沿革则溯唐而止焉。”^②“五级齐全的区划只有一个特例,即中书省(约今华北各省区及山东、河南北部)——上都路(今河北北部、内蒙古一部分)——顺宁府(今河北涿源至宣化一带及山西灵丘等县)下辖保安、蔚(今河北涿鹿、蔚县一带)两州,州下分别辖一县与五县。”^③

二、风雨飘摇的邢州

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曾以国都、州治、路治、府治等多种行政形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名称曾多次变化:邢、襄都、信都、邢州、顺德。邢州^④和顺德(1262—1911)在邢台发展历史上都是长时间使用的名称,邢州历隋、唐、宋、金、蒙古,顺德历经元、明、清。一定程度上,邢台历史由隋、唐、宋、金时期的邢州向元、明、清时期的顺德路(府)的行政建制演变,可以看作邢台地方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

① 危素:《保定路总管府题名之记》,转引自:刘铁增:《一通刻了十二年的碑》,《文物春秋》,第1996年第3期。

②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③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8页。

④ 邢州建制主要存在于596年至1265年,期间唐天宝元年(742)改为巨鹿郡,至德二年(757)复邢州,宋宣和元年(1119)改称信德府,金改邢州。